

中国近代报刊史 参考资料

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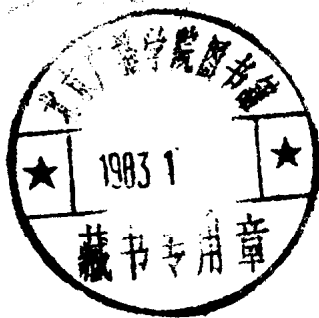
校内用书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中国近代报刊史 参考资料

上册

1102369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说 明

《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是本系为适应教学需要而编选的。辑录了有参考价值的各项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有关的文章）共一百五十篇。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各类报刊简介。

第二部分：外人在华办报的有关资料。

第三部分：近代官报的有关资料。

第四部分：戊戌维新时期报刊史的有关资料。

第五部分：辛亥革命报刊史的有关资料。

第六部分：近代报刊出版法令。

第七部分：其他。

未附本书未收的和近代报刊史有关的文章和资料的目录，供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时参考。

这部参考资料是由任课教师和七八级研究生冯迈、谷长岭共同选录的，由于时间仓卒，疏漏不当之处在所不免，请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事业史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一)

- 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 戈公振 (1)
- 中国各报馆始末 [英] 李提摩太 (12)
- 外资经营的中文报刊 戈公振 (14)
-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外文报刊 戈公振 (23)
- 中国各报存佚表 梁启超 (39)
- 清季重要报刊目录 张静庐 (46)
- 晚清小报录 阿 英 (59)
- 辛亥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 冯自由 (88)
- 辛亥革命杂志录 张于英 (111)
-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出版的期刊
简介 张 榭 王忍之 (116)
- 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 戈公振 (123)

(二)

- 《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序 (126)
- 《特选撮要》序 (127)
-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序 (130)
- 《六合丛谈》小引 (131)
- 《申江新报》缘起 申 报 (133)
- 论本馆作报本意 申 报 (135)

论报馆	[英]李提摩太	(136)
报中杂论跋	[英]李提摩太	(137)
华文报纸第一种	戈公振	(139)
基督教文字播道事业谈	甯 海	(142)
《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 《中西教会报》	舒新城	(147)
《上海新报》的二十年	胡道静	(153)
外国侵略者办的《上海新报》与太平 天国运动	杨瑾琤	(157)
《申报》六十六年史(节录)	胡道静	(162)
《申报》过去之现状	雷 瑄	(179)
《新闻报》四十年史	胡道静	(185)
福开森与《新闻报》	严独鹤	(195)
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	宁树藩	(202)
《华字汇报》与华工禁约	阿 英	(210)

(三)

奏设印刷官报局片		(215)
奏改设《内阁官报》以为公布法令机关折		(216)
《北洋官报》序		(218)
《政府公报》条例		(220)

(四)

乙未戊戌间全国各地主要报刊

负责人题名	汤志钧	(224)
太平天国之办报条陈	洪仁玕	(226)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	王 韬	(227)

日报	郑观应	(228)
报馆	陈 焯	(231)
新政策(节录)	[英]李提摩太	(232)
论中国宜设洋文报馆	陈 衍	(235)
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王 韬	(238)
整顿报纸刍言	申 报	(240)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梁启超	(242)
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馆折	李端棻	(245)
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折	孙家鼐	(250)
读上谕催办官报局恭注	《中外日报》	(252)
汪康年启事	汪康年	(254)
创办《时务报》原委	梁启超	(257)
《强学会报》序	康有为	(263)
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	王 照	(264)
《知新报》缘起(节录)	吴恒焯	(267)
论设立《时务日报》宗旨	汪康年	(271)
《湘学新报》例言	徐仁铸	(274)
《湘学报》序	江 标	(276)
《湘报》序	唐才常	(277)
《湘报》后叙(上)	谭嗣同	(280)
《湘报》后叙(下)	谭嗣同	(281)
《国闻报》缘起	严 复	(283)
《无锡白话报》序	裘廷梁	(286)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	梁启超	(289)
关于查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的上谕		(291)
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	张之洞	(291)
致长沙徐学台	张之洞	(292)

札江汉关道查禁悖逆报章	张之洞	(293)
《清议报》叙例	梁启超	(295)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		
及本馆之经历	梁启超	(297)
敬告我同业诸君	梁启超	(308)
王韬——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		
政论家	方汉奇	(313)
王韬——清末变法论之首创者及中国报道		
文学之先驱者	谢无量	(319)
戊戌政变五十年祭与中外日报	胡道静	(336)
梁启超的时评	王芸生	(373)
《大公报》序	英 华	(378)
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	王芸生 曹谷冰	(379)

(一)

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①

——一九二七年

戈 公 振

(一)

自报纸历史上言之，“邸报”之产生，为政治上之一种需要，汉唐当藩镇制度盛行时，其驻在京师之属官，皆有“邸报”之发行。其纪载甚简单，无非帝皇诏令，诸臣奏议，与官吏升降而已；清初改称《京报》，其性质与前代无异。狭义言之，“邸报”与《京报》不过辑录成文，无评论，无访稿，似不足称为报纸，然当时消息，公开传布，惟此类物则谓其已具报纸之雏形，亦固无可非议也。“邸报”与《京报》之发行，初为朝廷默许之一种事业，有手写者，有木刻者，有木板印刷者。清末下诏，预备立宪，方正式发行《政治官报》，为朝廷宣布法令之机关。而当时各省所发行之南北洋官报等，且于谕折外有评论，有新闻，俨然与官报相颉颃。官吏有知宣传之利者，或自出资创办报纸，或收买报纸以为一己之喉舌，此为半官报之滥觞。迨民报论调，多数转而鼓吹革命，清廷曾于内地厉行封禁，有代以官报之意，惜裨政百出，与人民希望相左，辛亥之

局既成，非空言所能挽也。

搜集社会发生之事件，以一定时期印行者，自西历一六一五年起，创于德国之政府报（Frank furter Journal），而踵行于欧美各国。后二百年基督教新教教士东来，师其成法，于一八一五年发行华文月刊，刊名《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者，是为我国有正式报纸之始，发端于南洋群岛；流行于通商口岸，如澳门、广州、香港、厦门、宁波、上海、天津与汉口等处。同时又发行西文报纸，调查中国风土人情，为其国人来华之向导。总之，其目的不外传教与通商二者，以厉行殖民政政策而已。西报之论调，有时似若为我国借箸而筹，实则大半便利私图，为外交上之一种策略。今且利用军阀之争，以鼓吹遏止革新运动，传播国际间之恶空气为事，肆无忌惮，此诚我国仅有之怪现象也。

英美在华之官吏教士，于光绪十三年，设广学会于上海，以赞助中国革新相标榜。其最初之手段，在翻译新书，发行杂志，我国人颇受其影响，故中日一战之后，学会纷起。而强学会为尤著，其所发行之《中外纪闻》与《强学报》，主张君宪，实开华人论政之端。戊戌政变后，有志之士，既绝望于朝廷，乃举其积虑，诉之民众。有以介绍学艺为已任者，有以改良政治为目标者，于是一般对于报纸，不仅单纯的商情观念，而渐有活泼的政治与艺术思想。未几革命之说起于香港，蔓延于上海，沸腾于东京之留学界，而种族学说，尤单刀直入，举世风靡，虽清廷屡兴文字之狱，而前仆后继，不底于成不止。国人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当以此为极度矣。

共和告成以后，革命之目标失，报纸之论调，或主急进或主缓进，然其望治也尚同。迨经洪宪复辟之祸，受年年军人利诱威胁之蹂躏，舆论颠倒，道德堕落。北京为政治中心，因利津贴而办报者有之，因谋差缺而为记者者有之，怪状尤百出，于

是杀记者封报馆之案，亦屡见不鲜。自好者流，翻然觉悟，改向本身努力，以求经济之独立，然商业色彩太浓，渐失指导舆论之精神，是其病也。不过自全体言之，欧战以后，报界思想之进步，不可不谓一线曙光，如对内则有所谓废督裁兵之主张，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苟循斯途以进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

(二)

自报纸内容上言之，同光间之报纸，因受八股盛行之影响，仅视社论为例文，经甲午、庚子诸变后，康梁辈之新民自强诸说出，始为社会所重视。革命派之报纸，则以社论为主要材料，执笔者亦一时知名之士，惟其有明确之主张，与牺牲之精神，故辛亥革命乃易于成功耳。当光绪末宣布预备立宪时，各报均延学律之士主笔政，《时报》创始后，曾于社论外别立时评一栏，分版论断，扼其机枢，与今之模棱两可，不着边际者截然不同，故能风靡一时。民国初元，报纸之论调，虽以事杂言庞为病，然朝气甚盛，上足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乃洪宪以后，钳口结舌，相率标榜，不谈时政，惟以迎合社会心理为事，其故或以营业为宗旨，不欲开罪于人，或有党派与金钱之关系，不敢自作主张，于是人民无所适从，军阀政客无所顾忌，造成今日之时局，报纸不能不分负其责也。

以新闻言，嘉道间杂志以教务为主要材料，商务次之，如教士之来去，船只之进出等是。咸同间日报踵起，以《京报》为主要材料，辕门钞次之，各公署牌示又次之，余为琐闻，然亦以官事为多。严格论之，直翻版之官报耳。光绪初，港沪西报渐多，译较便，同时两地报纸互相转录，材料乃不虞缺乏，

然关系政治问题者仍不敢登载，故《聊斋》式之社会消息，乃占重要位置。甲午以后，维新运动发生，政治新闻始见进步，各国之新事新物，亦能尽量介绍。自戊戌政变以迄辛亥革命，则篇幅几为政治新闻所独占。外交问题，虽注意而不甚了解，欧战以后，经过巴黎、华盛顿诸会议，始稍明了世界大势，而时见有统系之记载。年来因教育实业之发展，社会新闻已大改观，如教育商务之各有专栏是，然因军事扰攘，仍不免偏重于政治方面也。

以文艺言，初均以诗文戏评为补白之唯一材料，上焉者为斗方名士，自矜风雅之场；下焉者则以提倡嫖赌为事，腐气满纸，不堪入目。庚子以后，此栏始稍稍改观，时有关系政治之作。民国以后，虽篇幅大拓，而迄未脱旧日窠臼。欧战以后，世界思潮一变，《时报》别创《教育周刊》以灌输新潮，《晨报》、《国民公报》等踵起，于文艺上遂发生一大革命；不过重理论而轻事实，杂志之色彩太浓，未为一般读者所欢迎。近《申报》增设之《艺术界》，以介绍音乐、绘画与新书为事，新闻为主，议论为辅，渐有改良社会之倾向焉。

以广告言，其形初均若今日之分类栏，其性质亦完全属于商务者。甲午以后，始有学校广告，书报广告亦渐多。《申报》初创时，取价：西人广告较华人广告为贵，但以华人殊无登广告之习惯，故不久取消，西人广告因是充满于各报。关于医药化妆品之类占地又特大，华人尤而效之，于是不道德不信实之广告日多。近年以外交关系，拒登英日广告，英日广告之数量，在外人广告中为最多，各报收入大受影响。然因报纸日见流行，渐得社会之信仰，华人广告已渐增多，凡有公告性质者，几无不以报纸为媒介。不过报纸之营业色彩亦渐重，至将广告登于新闻之中，颇碍读者视线，有时且为广告而滥登不道德不信实之

新闻与评语，此则亟宜矫正者也。

(三)

自报纸外观上言之，最初报纸之形式，无论每日出版或两日以上，几一致为书本式，即以大张发行者，亦分页可以裁订。至光绪末叶，日报尚多如此，盖当时报纸之内容，新闻少而文艺多，直与书籍无异，故报纸常再版出售，而不闻有明日黄花之讥。至《时报》始废弃书本形式，而形式上发生一大变迁。民国成立以后，报纸渐多，形式已归一律，其内容亦新闻日增而文艺日减，舍杂志外，遂不复为保存之便利计矣。

日报创自西人，故形式初亦与西报无异，分每页为四五直栏，其排列由上而下，至《申报》始废直栏，其排列由右而左，至《中外日报》始分横栏，至《时报》始分一纸为四大页，即今日通行之形式也。当《时报》初创时，其形式颇为社会所反对，以为面积太大，不便阅览，亦可见习惯之足以困人也。

日报之编制，其初首为论说，亦有无论说者，次为新闻，其题目均为四字成语，逐日更换用之，末为诗文，均杂登一处。至《中外日报》^②，始分论说、电报、国内外本埠新闻及文艺诸栏，各报仿而行之，编制始见改良；然同一新闻常分载于前后数栏。又如沪上各报，年来电报字数激增，但亦以地方为纲，均不免缺乏统一之感。三年前《时报》始于电报试加题目，直奉战事起，又将电报与新闻合登，以事实为纲，不为栏所限制，当时报界有非笑之者，今亦渐成各报之通式矣。

以印刷言，虽属机械作用，然报纸之进步，亦可于其中见之。嘉道间报纸多木版印刷，咸同间始多铅印，但印机甚陋，每小时只印一二百小纸。光宣间石印机与铅印机输入日多，报

纸每日可出数千大张，然所用犹普通之印书机也。近来报纸销数大增，为缩短时间计，乃不得不用印报轮转机，每小时可印四大张者万份；同时为美术上之配置，且有用套色印报轮转机者。今因时局俶扰，各报常于最后数分钟内竞争消息之先后，则机械方面之改良，尚方兴而未艾也。

发行亦有可言者，嘉道间报纸多系送阅，咸同间报纸多系挨户乞阅，光宣间报纸始渐流行，然犹茶余酒后之消遣品也。共和告成以来，报贩渐成专业，派报所林立，近则上海各马路之烟纸店，均有报纸出售，于是报纸有渐与日用品同其需要之趋势矣。

(四)

自报纸统计上言之，我国报纸之发展，其信而有征者，据《时事新报》记载，由嘉庆廿年至咸丰十一年之四十六年中，计有报纸八种，均教会发行，至光绪十二年增至七十八种。以地域言之，计新加坡一带六种，香港六种，广州二种，台湾、厦门、汕头共五种，福州三种，宁波二种，上海三十二种，汉口五种，九江一种，北京一种。以时期言之，计月刊三十六种，周刊八种，日刊一种，余或隔一日二日不等；是二十四年中，较前加之九倍强。又据《第二届世界报界大会纪事录》载，民国十年全国共有报纸一千一百十四种，内日刊五百五十种，二日刊六种，三日刊九种，五日刊九种，周刊一百五十四种，旬刊四十六种，两周刊五种，半月刊四十五种，月刊三百〇三种，季刊四种，半年刊一种，年刊一种；是四十年中较前又加至十五倍弱。今据中外报章类纂社所调查，最近二年中，华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共有六百二十八种。以地域言之，北京第一，

计一百二十五种，汉口第二，计三十六种，广州第三，计二十九种，天津第四，计二十八种，济南第五，计二十五种，上海第六，计二十三种。又外国文报纸之每日发行者，计英文二十六种，日本文十六种，俄文六种，法文三种，朝鲜文一种。就日刊一种言之，三四年中又有若干进步，若合以华侨报纸、学校报纸、公私政治学术社会团体之报纸，及一切属于游艺性质之报纸，不论每日发行或二日以上，其数当在二千种左右。就本国言之，诚不无多少乐观，然日本人口仅七千六百万，有报纸四千五百种，我国人口四万三千六百万，只有报纸二千种，不啻一与十三之比，况销数又不逮远甚，欧美更无论矣，故从我国地大物博人众种种方面言之，现有之报纸，不能谓供求相应也。

(五)

自报纸改进上言之，言论自由，为报界切肤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则报纸绝无发展之机会。慨自洪宪以还，军人秉政，祸乱相寻，有若弈棋，报纸之言论与记载，苟守正而不阿，则甲将视为祖乙，乙又将视为祖甲，故封报馆，扣报纸，检阅函电，十余年来，数见不鲜。然而返视报界，则涣散特甚，无一机关可代表一地方之报纸，遑论全国。甚有幸灾乐祸，以他报之封闭或扣留为快者，彼且不自尊，欲人尊之也得乎？夫《出版法》之废止，要求亘十年之久。《出版法》废止矣，而邵飘萍、林白水之流，可以身死顷刻，则更无法律可言，岂不足以促我报界之觉悟耶！然英国有以“红旗”名报者，德国有以“炸弹”名报者，国会中有共产党，而其政府不之禁也。总之在位者不论何人，绝不喜言论自由，其摧残也亦易，惟在报界

一致团结，以与之抗，而人民又当为报纸之后盾，随时防止恶势力之潜滋，不稍松懈。盖思想不能发表，徒成空幻，思想者必甚感苦痛，而郁积既久，无所发泄，终必至于横决，国家命运之荣枯系之，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

报纸为公众而刊行，一评论一记事，又无往而非关于公众者，故为公众而有所陈述，报纸实负有介绍之义务也。此种陈述，依其性质，可分而为二：一为积极的希望公众事业之进步者；一为消极的更正新闻记载之谬误者。我国报纸之态度，普通对于前者似认为主笔之专责，对于后者则视为当事人之特权。其偶设有“自由投稿”栏者，亦名难副实，一则因报纸不肯尽量宣布，以开罪于人；一则因投稿者常取谩骂态度，有越范围。于是“议论公开”之说，在我国遂未由实现。其在欧美，无论何人，凡关于公众之问题，均可投函报纸，苟三次不予发表，得诉诸法律，不过报纸为节省地位，得酌量删削耳。吾意议论公开而后，公共之意思乃见，今我国报纸之所重视者，只一般所谓“名人”“要人”之文电，然大半皆私见而非公论，大半皆政治问题而非社会问题，深愿主笔政者，今后能移易其眼光，开豁其胸襟，予平民以发抒意见之机会，勿执己见，勿护过失，而第以寻求真理为归也。

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今报纸所载之新闻，大半得诸通讯社，而此种通讯社，并非为供给新闻而设，纯系一种宣传作用，于是人民不能于报纸上觅得正确之事实，而对于国家或国际政策之思想，遂易误入歧途，而无由集中，此至可痛惜之事也。英国名记者北岩(Northcliffe)曩在申报馆演说，谓“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全国独立之报馆。”我国报馆，苟不以依赖为可羞与至危，则当憬然觉悟，合全国各大报馆，组织搜集新闻之机构，以正确之中国事实，传播全国与世界，此匪特有

助于国家之统一，良好政府之建设，及他日少年中国愿望之实践，即各国亦可因此明了我国之现状，而消除其隔阂，其有益于世界之和平实远且大也。我国字数，据《中华新字典》所载，多至四万有余，常用者不过四千。民国七年，教育部曾颁布注音字母，民国十二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曾函请各报改用语体文，而各报狃于积习，且因时间与经济上之关系，迄未有所表示。夫报纸为普及教育之利器，乃世人所公认，我国教育之不普及，又无待讳言，吾意报纸当此过渡时期纪事之文，宜力求浅显，勿引古典，勿用冷僻之字，字数如能仿照日本报纸办法，减少至二千八百枚则尤佳，必使具小学毕业以上程度者，即有读报之机会；至文艺作品，当然不必拘定如此，则于文化之传播上大有裨益也。

海通以后，报纸日有外事之记载，如 England 之为英国，Paris 之为巴黎，Christ 之为基督，Motor 之为马达，因习用已久，为读者所审知，然偶遇稍冷僻之地名人名，或事物之名，则译文此报与彼报异，今日与昨日异，甚至同日之记载，前后又异。间有贩自日本者，如俄国之劳农政府，其原名本含有多数党意义，非如今日之所谓“过激派”。日本因此种主义不利于彼，故称之为过激以骇人听闻，而吾国报纸沿用之，去真意殊远。故吾国报界，应联合学术团体，延邃于中西文字之士，根求西文之字源，不问其为何国文字，而以一译名为标准，使成中国化。音义并译者为上，译义者次之，译音又次之。在此种标准译名未订定之前，各报如遇非通行之译名，须附列原名，俾读者易于考查。此事虽小，而关于一国之文化实大，在外人文化侵略之际，更有纠正上述错误之必要也。

在最近数年中，报界有二种新事实，有不可不注意者，即记者与工人之渐知团结，是盖报纸既成为社会之必需品，同时

报纸又趋于商业化，于是有此二种反动发生。如记者之所谓“星期停止工作”案，如工人之所谓“废除工头制”案，虽皆未见实行，然与报馆当局，若已立于相对之地位者。又如上海报贩所组织之捷音公所，广州报贩所组织之派报总工会，隐操推销报纸之权，因利益多寡之关系，常与报馆起齟齬。且年来工潮澎湃，报馆工人时被牵入漩涡，报纸停刊，数见不鲜。此虽为一般政治与社会问题，然既与报馆直接发生影响，应如何研究预为消弭之乎！

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器然，则公共意志自然发现，而舆论乃有价值而非伪造。否则报纸自报纸，国民自国民，政治自政治，固毫无关系也。我国报界之知此义者盖寡，故报纸之进步甚缓，而最大原因，即为缺乏专门人才。盖昔之服务报界者，大半非科举化之人物，即法政学生化之人物，抱“学以为仕”之传统心理，视报纸为过渡宝筏。彼心目中只知有政治，故不知社会之重要；只知有官，故不知国民之重要；因官僚幕下集中式的政治，故只知有中央而不知地方之重要；又因功利心热，投机心切，至甘心为政治机关为党派利用，则亦必至之结果也。夫报纸有公众之需要而刊行，则纪载当根据国民心理，而后发达可期，今不问中央新闻、地方新闻与本埠新闻，均不离乎政治，而所论及者又为政治中最卑鄙而无思想学术关系之一片段，其不受社会欢迎必矣。因是报纸之生活愈难，遂愈不得不卵翼军人政客之下，寢假而记者随意下笔，便谓为代表舆论，军人政客利用几